

对城市主政者来说，整齐划一、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,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相悖的审美秩序，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，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。北宋政府承认既成事实，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，克制住权力的冲动。

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，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

如果我们有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，将会发现，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。长安城方正、规整，街道笔直如削，以直角交错，将城廓分割成一百零八坊（居民区）与东西二市（商业区），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。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，全城的坊、市、道路、城墙均呈左右对称。白居易形容长安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”，很传神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严格按照图纸，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，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。为追求恢宏大气、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，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。以致到了盛唐之时，长安城内南部各坊，居然还“率无第宅，虽时有居者，烟火不接，耕垦种植，阡陌相连”。

相比之下，北宋的汴梁就显得不怎么规整了，不但城墙不很端正，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，斜街、斜巷处处可见。汴河斜斜穿过城廓，借着河流带来的交通便利、货物往来与人烟凑聚，沿河一带慢慢演变为城内最

繁华的街市之一。所有的街市看起来都是那么拥挤、喧闹、嘈杂，但又富有生气。城墙之外，自发形成的热闹市镇与城内连成一片，所谓“十二市之环城，囂然朝夕”。这样的城市格局，与其说是行政权力“规划”出来的，不如说是民间社会“生长”出来的。

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，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。唐代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“坊市制”，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，有坊墙相隔离。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，要做生意，只能到东西二市。两市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，“凡市，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。日入前七刻，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”，散市后即关闭市门；而且“居必求其类”，官民分居，秩序森然；又有“夜禁”之制，城门“昏而闭，五更而启”，禁止市民夜行，“诸犯夜者，笞二十”。

而在北宋的汴梁，坊墙已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倒，坊市制瓦解了，人们沿河设市，临街开铺，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。官民杂处，商民混居，“夜禁”也被突破，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如要闹去处，通晓不绝”。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，正在兴起。今天我们展开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，那种繁华气息仍能扑面而来：东京城内外，店铺鳞次栉比，商贩旅人云集，酒楼歌馆遍设，商业广告满街，瓦舍勾栏布于闹市。

与《清明上河图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今日网友 PS 出来的一组恶搞图片《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》：画面中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如狼似虎的“城管”，商贩抱头鼠窜，原来繁华似锦的汴梁街头，立即变得空荡荡，只留下一地狼藉，以及涂在墙壁上刺眼的“拆”字。这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 PS

图片戏谑地讽刺了一把当前社会的“城管现象”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在会心一笑之余，有心人大概也可想一想，城市秩序当如何维持。这个问题不是今日才有，也困扰过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宋代社会。

不管是设“城管”，还是“搞拆迁”，无非是在“自发的繁荣”与“管制的秩序”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

一些网友抚今追昔，以为宋朝没有“城管”。其实不对，宋代是有“城管”的——当然那时候不叫“城管”，叫“街道司”。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、整修与日常秩序，而不是成天驱逐小商贩，追鸡撵狗。不过，如果汴梁的商贩占道经营，严重妨碍了交通，街道司是可以干涉的。

宋朝也有“拆迁”。作为具有“自发成长”性质的商业城市，拥挤与喧哗似乎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。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，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，竟开设商铺、侵占街道，各种“违章建筑”层出不穷，在当时，这叫做“侵街”。因为侵街严重，以致“坊无广巷，市不通骑”。

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，宋朝政府专门设立“街道司”，介入对城市秩序的维护，乃至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，都是可以想象的。因此，北宋汴梁的拆迁记录在文献资料中并不鲜见。比如开宝九年（公元 976 年），宋太祖便“宴从臣于会节园，还经通利坊，以道狭，撤侵街民舍益之”。

据文献记载，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“搞拆迁”的几个特点，这对今

日的城市治理不无启示。首先，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。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，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，比如太平兴国五年（公元 980 年）七月，八作使（相当于城管队长）段仁海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，侵占景阳门街。宋太宗大怒，“令毁之，仁海决杖（处以杖刑）”。咸平五年（公元 1002 年）二月，因为“京城衢巷狭隘”，宋真宗诏令谢德权“广之”，即负责拆迁工程。谢德权“先毁贵要邸舍”，以致“群议纷然”，连皇帝都顶不住了，下诏叫停，谢德权坚决不从，说：“今沮事者，皆权豪胥，吝室舍儗资（租金）耳，非有它也，臣死不敢奉诏。”碰上这种牛脾气，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，只能“从之”。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，然后恢复“禁鼓昏晓之制”。禁鼓，即街鼓，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，昏晓各敲响一次，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。

其次，对侵街的斗小民，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，而顾全其生计。如真宗天禧四年（公元 1020 年），“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，上以劳扰不许”。又如元祐五年（公元 1090 年），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，说虽然“百姓多侵街盖屋，毁之不敢有怨”，但“有司毁拆屋舍太过，居民不无失所”，所以，他要求皇帝下旨，“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，无令过当拆屋”。

为适应蓬勃发展起来的街市，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，竖立“表木”，作为禁止“侵街”的红线。红线之内，允许设摊、开店，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。现在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在虹桥两头，就立有四根“表木”，桥上两边，小商贩开设的摊位，都在“表木”的连线之内，中间留出通行的过

道。这样，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，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。

最后，对皇城扩建、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，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。如雍熙三年（公元 986 年），宋太宗“欲广宫城，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，以居民多不欲徙，遂罢”。康定元年（公元 1040 年），宋仁宗“车驾行幸”，尽管当时街道狭窄，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、封路什么的，而是简化了仪式，“侍从及百官属，下至厮役，皆杂行其道中”，“而士庶观者，率随扈从之人，夹道驰走，喧呼不辍”。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，这简直有点不可想象。

不管是设“城管”，还是“搞拆迁”，无非是在“自发的繁荣”与“管制的秩序”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。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下，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：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，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，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，并忍受一定的代价。对城市的主政者来说，那种整齐划一、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，所以宋初曾试图恢复坊市制，如谢德权重设禁鼓，便有此意。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相悖的审美秩序，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，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。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，“二纪（近二十四年）以来，不闻街鼓之声，金吾之职（掌禁鼓的官职）废矣”。到北宋中后期，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，也很少有“过当拆屋”的行为了。这意味着，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，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，克制住权力的冲动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摘自《同舟共进》2013 年第 6 期

绝响：永远的邓丽君

姜捷



10.终于下了痛苦的决定——“休学唱歌”

邓妈妈回忆起这段日子，大人心里的确是作过一番挣扎。邓爸爸原本一直不希望她这么小就走上演艺的路子，邓妈妈则是看她自己的意愿。邓丽君在深思过一段日子之后，告诉妈妈她的想法：“要出人头地，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现在没有办法读书，将来总是可以弥补。”眼看着前面的路子已铺成了一个成功的雏形，现在放手以后，难保还有没有机会等着她；就算放弃目前一切，而选择继续读书，以她的成绩和兴趣，能不能读出什么名堂来也未可知。

邓丽君自己思考很久，终于下了痛苦的决定——“休学唱歌”。即使心中有着许多遗憾，她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错。台湾一直是升学主义至上、学历文凭挂帅，以她的年龄，能看清“行行出状元”的事实，毅然做出不流于俗的选择，应该是她对自己知之甚明。所谓“没有超俗的思想，不能尝试破俗的行为”，邓丽君给自己的前途打过算盘才下决心，这个抉择的当口，她早已期许自己的未来要有所作为。她并不是能被人左右意识，或被牵着鼻子走的泛泛之辈。

对于后来媒体上有诸多指责，认为她在初中就为生活被迫休学，要负担全家人的生计，是斯巴达教育下压迫的牺牲者，邓爸爸、邓妈妈只要钱，不顾孩子前途的说法，其实是无中生有的猜测！批评的人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生存法则，而一个非池中之物的少女，又岂是世俗的模式所能有限的呢？邓妈妈说，邓丽君从小就很有主见，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这条路，光靠别人强迫、压榨，就算是再孝顺，也不可能高高兴兴走出成功的风光来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邓丽君黯然离开学校，告别了制服与书包的日子，没有道别也没有欢送，只带走几个好友的祝福和老师的叮咛。步出金陵女中时，踽踽独行的单薄背影，让不少喜欢她的老师、同学为之鼻酸。但她的伤感是短暂的，因为一连串的演唱行程，满得让她来不及去咀嚼走

出校门之后的失落感，她像往常一样带着笑容与自信，迎接属于她生命中的音符与旋律。1969 年，邓丽君才十六岁，人们喜欢她清纯活泼的模样，在她快乐的说说唱唱、蹦蹦跳跳里，让人不自觉地打心底欢愉起来。

事实证明，日后她从未间断过高昂的学习情绪，除了自学之外，更到美国读大学、赴伦敦进修，成绩都不错，精通数种方言及多国语言的“才华”更为人所敬佩。在日本曾陪着她一起学日语的邓妈妈腼腆地微笑细数那段学习时光：“我们是一起到日本的，给她请了日本老师做一对一的会话教学，其实我也有老师，两人学习语言的起跑线本来是一样的，哪知道才三四天，她就敢叽里呱啦地和邻居讲起话来！我在旁边听了好惊讶，从那以后，有依赖心嘛！我就越学越慢，她越学越快，到了真正需要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，她都可以直接和人家对话了！”我好奇地问：“那大约是多久呢？”邓妈妈笑着说：“我哪能记得多久？但快得就像是她原来就懂日本话似的，我最高兴的是，有一次在等她开会的时候，一位先生向我鞠躬，好像是夸我把女儿教得很好，她的言谈遣词用句都是有教养的、受高等教育的人家才会用的话语。我想，这哪是我教的呀！是她自个儿用功学来的呢！但是，光是要解释这句话我都说不好，想想算了，就微笑接受他的赞美啰！”我们都笑了，这是在数十次采访中，难得看到邓妈妈笑得那么开心。

有一名记者观察邓丽君的成功关键是：“敏锐、善感却不自怨自艾，能正面思考事情，并严格要求自我。”如果她的演唱生涯稍微羡慕名利，贪享虚荣荣华，可能就不会选择这样难走的路，对自己有这样高的要求，而她的成就也可能一下子就成为泡影。但是，她给自己的定位不是唱唱小歌厅、跑跑秀场而已，她要唱就唱出让所有人都爱听的歌；她希望她的唱片能像小时候家中常转的唱盘一样，为多少个只有生活压力、没有娱乐的家庭带来轻松、带来纾解，那些隽永而抚慰人心的老歌，那些慷慨激昂而振奋人心的歌曲，那些大街小巷响起的流行音乐；她盼望唱片的普及带给人们好的视听生活，而不是只有少数有钱人才听得起的歌厅秀。

6.快发求救信号
水波问：“钓鱼？拿什么钓？”“用鱼钩呀，”欣荣坐起来指着救生工具箱，“这里面有供遇难用的鱼线和鱼钩。”他取出鱼线和鱼钩。“用这能钓到鱼？”水波不信。“当然，海里鱼很容易上钩。”“钩上去怎么办？”“还用问，吃呀。”“就吃生的？”“怎么，还想红烧、油炸？”欣荣瞥她一眼。欣荣拿着鱼钩，现在就缺鱼饵。忽然他叫一声：“水波，你看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你看，救生筏口。”欣荣轻声道。果然，水波看到一只很大的鸟立在筏口。奇怪，它从哪里来呢？这么多天，除他俩，每天间她没看到另外的活物，现在竟然有一只鸟来做伴，她不无兴奋。鸟儿也发现他们，昂着脖子，转动眼睛，好奇地望着他俩。“它一定飞累了。”欣荣分析，“我去逮它。”

欣荣爬向门口，鸟儿果然累了，也不动弹。欣荣一把抓住它，鸟儿吱、吱叫了两声。欣荣愧疚地说：“鸟儿，鸟儿，为了活下去，咱们只能让你牺牲作贡献了。”

欣荣将一块鸟肉固定在鱼钩上，将鱼钩抛下海。放了一段鱼线，然后趴伏着观看海面。很快就有鱼咬食，将线绷紧。欣荣收线。鱼浮出水面。“哇！”水波不由叫起来，那是条长约 1 米，有 10 多斤重的大鱼。鱼体像纺锤，流线型，皮肤呈蓝色，背侧有浅色斑纹，非常漂亮。“这是什么鱼？”水波没见过。“这叫鲷鱼，是金枪鱼的一种，肉味鲜美。”

欣荣将鱼分解，头尾内脏去掉，将嫩红的鱼肉切成薄片。水波接过鱼片，咬一口，嫩滑细腻，比鸟肉好吃多了。

欣荣用记号笔在舱壁上划了一条特别粗的杠——第 30 条。整整 30 天了。“阿欣，快看那儿有条船。”水波看见远方有条船，兴奋地喊起来。“呵，一艘捕鱼船，”欣荣分辨。捕鱼船离他们愈来愈近。距离不到 1 海里。这是他们遇见的第 7 艘船。“阿欣，快发求救信号。”水波喊。“救生火箭没了，拿什么发信号？”水波缄默，陡然想起什么：“老船长临终前留下身上穿的衣服，说是可以让我们派用处。”

“对！”欣荣也想起来。“我来做个烟雾发生器。”他从座位下箱子里找出老船长留下来的一

堆衣服，放在空铁皮箱里，再取出一罐供照明用的煤油，浇在衣服上，点燃，然后浇点海水，弄湿，衣服上的火苗化成一股浓烟袅袅上升。烟雾冉冉升起。两人瞪大眼睛，看着来船。那艘船向他们一点点靠近、靠近。近得可以隐约看出船首的英文字母。他俩深信这次真得救了，两人都都快跳蹦出来。“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——”水波挥舞双手，用力呼唤。“嗨！——”欣荣也呼叫。然而捕鱼船却转了个 90 度，弃他们而去。“啊，你们——”水波好似挨当头一棍，一瞬间怔住。欣荣也觉得遭到一场难以容忍的骗局。水波突然跳起来要往海里跳。“你——干什么？”欣荣一把拉住她。“别拉我。”水波想挣脱，“我受不了，不想活了。”

欣荣说：“眼下这日子确实难熬，可世界上经受过这种苦难的人不仅你，有些人时间比这更长，受的苦更多。”“还有谁？”水波不信。“好，我说给你听。首先是美国航海家罗伯逊，一天他们的船失事，他和他妻子以及四个孩子乘像我们这样的救生筏在太平洋上漂流，渴了喝海水、饿了吃生鱼和海龟肉，就这样坚持 37 天。当然，这时间还不算

长，最长的是英国作家莫里斯夫妇。我看过莫里斯写的一本书。”“书上怎么说？”

“1973 年 3 月的一天，他俩驾驶着一艘 30 英尺长的漂亮的游艇离开巴拿马，准备横渡太平洋到澳洲和印尼去。行驶到第 4 天，游艇遭到一头数十吨重、受伤的巨头鲸的攻击，游艇被戳破沉没。夫妇俩只能像我们这样乘上救生筏。漂流途中他们先后遇上 8 条船，同我们一样，救生火箭放完，没有一条船发现并救助他们。一天天过去，筏上淡水和食物都吃完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像我们一样吃生鱼和海龟。你知道最终他俩漂了多少天。”“多少天？”水波被吸引。“117 天！”欣荣激动，“整整 117 天呵，他们横渡太平洋，漂了 4000 多海里，最后被一艘韩国船救起。他们的事迹报纸刊载后，读者的信像雪片似的飞向他们，赞扬他们那种打不败的精神。”

水波被莫里斯夫妇的故事、更确切地说，是被欣荣顽强的信心和激情所鼓舞。

印度洋的承诺

张士敏

